



庭院深深深几许 —— 走进佛寺

1. 佛与佛的故事

公元前 6 - 前 5 世纪，古代印度有一个迦毗罗卫（今尼泊尔南部提罗拉科特附近）王国，国王叫净饭王，夫人叫摩耶夫人。他们结婚许久却一直没有孩子。有一天夜里，摩耶夫人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头六牙白象驮着一个人从右肋撞入她的腹中。醒来以后，她觉得很奇怪。不久，夫人就怀孕了。国王非常高兴，精心地呵护她。按照当时的习俗，妇女生产时必须回娘家，所以，待到临产的时候，摩耶夫人便起程回自己的父母家去。半路上，突然一阵剧烈的腹痛袭来，她知道孩子要出生了。摩耶夫人走进路旁的无忧树林，双手抓住了树干。这时，奇迹发生了，一个漂亮而健康的男儿从她的右肋下出生了！天空飘飘洒洒降下芬芳的花雨为他沐浴。他在花雨中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第二步……就这样一直走了七步，每走一步，他的脚下便生出一朵洁白的莲花。然后，他站在那里，伸出右手指着天空，左手指着大地，大声地说：天上地下，唯我独尊。人们都被这情景震撼了。

摩耶夫人带着孩子回到王宫，国王为王子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会间，有一位老者预言王子将来不会继承王位，而要出家。国王听了大惊。从此，他瞒着王子，将王子与外面的世界隔离起来。他为王子挑选年青俊美的青年男女作为侍从，将王宫变成一个乐园，让娱乐和快乐整日陪伴着王子。就这样，王子渐渐地长大了，国王为他娶了妻子，他们夫妇还有了自己的孩子。王子始终不知道在自己的宫廷外面，还有另外一个世界。

有一天，王子坐着花车游玩，人们都向他欢呼。当走到东城门时，突然，在拥挤的人群中，王子看见了一张从未见过的脸，那是一张老人的脸，布满了皱纹。王子非常吃惊，于是他向南门走去。没想到一个被病痛折磨得痛苦不堪的病人正在那里呻吟，吓得王子急忙往西门跑。但是，西门正在为一位死者举行葬礼。他继续向北门跑，这时，他看见了一位悠然飘洒、仪表庄重的僧人。这一天，他看见了人们衰老、病痛和死亡的不同的状态，感到震惊，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于是，他下定决心离开家门去寻求解脱这些苦恼的办法。国王知道了他的打算，为了防止王子出走，他派士兵将城门把守起来。夜里，王子趁士兵睡觉时，悄悄骑着白马逾城而走。从此离开父母妻儿，开始了他的苦行生活。

王子首先来到苦修林中修炼苦行，整日不吃、不喝、不睡，渐渐变成了皮包骨头的样子，但还是一无所获。于是，他来到尼连河边，洗去了往日的尘垢，昏倒在那里。这时，一位女子为他送来了乳糜，喂他喝了下去。他苏醒过来，谢了女子，重新开始寻找解脱的办法。

王子来到一棵巨大的菩提树下打坐，沉思冥想了七天七

夜，战胜了风雨、魔王、魔女、魔军，终于悟出了“四谛”、“十二因缘”的道理，获得了觉悟，成了佛。当时他仅有 35 岁。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自己的感悟，王子首先在波罗奈城的鹿野苑为跟随他的弟子讲述这些理论。这一活动，佛教史上称为“初转法轮”。此后，跟随他的人渐渐多起来，不仅收下了五百弟子（其中著名的有十大弟子），还组成了佛教的僧团，并奠定了佛教的基本教义。他的名声越来越大，被尊称为“释迦牟尼”，意思是“释迦族的尊者”；或被尊称为“佛”，意思是“觉者”、“获得觉悟的人”。

这些颇具传奇性的记载，常常使佛经故事读起来引人入胜。在佛教雕刻和绘画等艺术作品中，这一系列的故事情节就像一幅幅活动的连环画，更是常常被淋漓尽致地雕刻在石窟中、佛教器物上，或被绘制在寺院的墙壁上。历史也就这样被记录出来。

事实上，佛教的产生是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相关联的。公元前 6 ~ 前 5 世纪，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时代，印度大地上出现了一些以城市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城邦国家。这些国家实行严格的种姓制度，把人分为四等，包括婆罗门（祭司）、刹帝利（武士、军事贵族）、吠舍（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与首陀罗（雇佣劳动者、奴隶、被征服的土著居民）。婆罗门居于当时的统治地位。各种姓的社会地位、权利、生活方式等都有明文规定，不能随意超越。而且，在婆罗门教所信奉的法典《吠陀》中还大肆宣扬这种等级制度是神的意志的体现，因为造物神“梵天”是用口创造出婆罗门的，用肩和手创造出刹帝利，用膝盖创造出吠舍，用脚创造出首陀罗。只有前三个种姓可以在死后再次转生为人，他们有权阅

读《吠陀》经典；而首陀罗则只有一次生命，无权阅读《吠陀》经典。人们必须严格遵守种姓法规，才能够转世为较高一等种姓，并能最后归于宇宙的最高主宰——梵。随着社会的发展，农业的地位提高，祭司的地位下降，婆罗门的地位也随之动摇；由于各城邦国间连年不断的战争，刹帝利的地位逐渐提高起来；吠舍阶层的一部分人沦为奴隶，另一部分人则成为工商业奴隶主或社会的占有者，随着他们在经济上的富有，进而要求相应的社会地位；首陀罗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他们不断进行反抗。这样，印度的社会便动荡不安起来。佛教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产生的。

面对着社会上日益尖锐的政治、经济问题，在思想领域也形成了两种主要思潮：一是传统的婆罗门教及其支脉，一是反婆罗门教的各派别，统称为“沙门”，主要包括顺世论、佛教、耆那教、生活派和不可知论。虽然有这么多的沙门派别，但他们的共同点都在于否认《吠陀》经典的权威，反对婆罗门的特权统治。

佛教是沙门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派别，它针对婆罗门教主张的《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的三大纲领，提出了自己的纲领：不承认《吠陀》的经典地位，宣传人人都可入教，不主张祭祀，并认为不需要祭司的引导，人人都可靠自己的修行达到不生不灭的涅槃境界，只要乐善好施，就可获得幸福和升入天堂。它还针对婆罗门教主张婆罗门为最高种姓，提出众生平等的主张，反对特权统治，因而受到除婆罗门外的其他一切种姓的拥护。

佛教的基本教义是在阐述“苦”、“空”二字，集中体现在“四谛说”、“十二因缘”、“三法印”和因果报应、轮回说

的理论中。

所谓“四谛”也叫四圣谛，是指四条真实不虚的真理，包括苦、集、灭和道谛。这就是释迦牟尼得道后，在鹿野苑为侨陈如等五人初转法轮时所讲述的道理。

苦谛是讲现实人生中所存在的种种痛苦现象。最基本的有八苦：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五取蕴（五盛阴）。前四苦本来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但人们往往意识不到，总是千方百计地找寻各种方法以求长生不老，由此而产生种种痛苦。后三种苦是人与人间的社会关系造成的，仇人总相见，相爱、相好却不能守在一起，需要的东西偏偏得不到，由此造成种种痛苦。但这诸种痛苦的原因却是“五取蕴”，也就是五盛阴苦。五蕴是指构成人的五种成分：色（物质）、受（感情、感觉）、想（理性活动）、行（意志活动）、识（统一前四种成分的意识）。它们与“取”即一种固执的力量联结在一起的时候，就会产生种种贪欲。因此就产生了苦。

集谛讲造成痛苦的原因或根据，也就是人本身所具有的“业”与“感”。一切众生贪嗔愚痴的行动，造成了善恶行为的业因，这种业因能感召将来的生死苦果。

灭谛是指苦的消灭，这是佛教修行所要达到的最高目标，也就是所谓无苦的涅槃境界。

道谛是指出达到涅槃境界的道路，即必须遵循的佛教理论和方法。

十二因缘说是佛教认识世界的哲学基础。佛教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处于因果联系之中，都因一定条件而产生变化，但各种条件的形成却是偶然的，一切事物的现象也都是由偶然的条件凑合而产生的，世界上并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一

一切都是变幻无常的。既然一切都变幻无常，当然也就一切皆空。这就是佛教的缘起说。十二因缘说就是通过这种缘起说来解释社会的人生现象。它把人生划分为十二个环节：无名、行、识、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它们的相互因果联系是：对佛理的无知（无名），引起人们世俗的意志活动（行），由意志引起精神统一体的“识”。识由名、色两部分组成，名指精神，色指肉体，有了精神和肉体，就有了眼、耳、鼻、舌、身、意（心）等六种感觉器官（六处），有了感觉器官就引起了对外界事物的接触（触），由触而生感受（受），由感受引起贪爱（爱），有了贪爱就有了对外界事物的追求（取），由取引起了各种思想行为，这些思想行为是能产生未来果的善恶业，故名为“有”。由以上的爱、取、有所生起的迷惑和所造的善恶业，必然产生果报，从而导致来世的再生（生）。有了生就必然有老、死。这十二个环节，辗转感果，所以称为因，同时又互为条件，所以称为缘，合称十二因缘。佛教认为人们若要解脱人生的痛苦，首先应从去贪爱着手，不要追求变幻无常的东西。

三法印是佛教针对人生的“无常”、“无我”而提出的三个命题。首先是“诸行无常”，认为世间一切变化物都是变幻无常的，没有永恒的事物；其次是“诸法无我”，世间一切事物都是因缘和合而成的，没有起主宰作用的实体、我或灵魂；第三是“涅槃寂静”，个人应该远离烦恼、解脱生死，进入超脱生死轮回的涅槃境界。

释迦牟尼在初转法轮之后，传教活动逐渐频繁起来，在当时印度众多的城邦国家中，他不断地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在历时 40 年的传教生涯中，他走遍了摩揭陀、拘萨

罗、拔沙三个王国以及其他更远的地区。佛教初传时，得到摩揭陀国频婆娑多及其子阿闍世王的大力支持，后来，又赢得了拘萨罗国波斯匿王的皈依，势力渐渐扩大起来。尤其到了摩揭陀国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时代（约前 273 - 前 32 年），阿育王用武力征服了周围的许多国家，建立了印度历史上第一个幅员辽阔的统一国家，佛教也随着阿育王的胜利，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阿育王南征羯陵伽国时，杀害了十万人，但他感到仅仅依靠杀伐是不行的，还要依靠佛法来征服人心。因此，他便在帝国境内宣布佛教为国教，开凿岩壁，或树立石柱，上面刊刻诏令，宣传和推广佛教。他还特地召集佛教高僧在华氏城举行结集，编纂、整理了佛教经典的经藏、律藏和论藏三藏，以期解决佛教各派的争端，更好地推广佛教。与此同时，他不断派人到邻国去宣传佛教，使佛教的传播超出了印度国界，远及今日的斯里兰卡、缅甸、巴基斯坦、马来半岛、叙利亚、埃及等国家。

此后，到贵霜王朝时期，迦腻色迦王在中亚西亚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他效法阿育王，在征服别国时，提出的首要条件是让他们必须信奉佛教。当他在揭陀罗定都后，立即建造了大庙和佛塔，如号称百丈浮屠的“雀离大塔”就是由他建造的。他还开始雕刻佛像、菩萨像，形成了世界著名的犍陀罗艺术，开创了佛雕艺术的先例，对后世的佛像崇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释迦牟尼去世后，约在公元 1 世纪时，佛教分化成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两大派别。所谓“乘”即是“乘载”或“道路”之意，大乘是大道，小乘是小道。意思是将众生从生死此岸运载到欢乐无忧的彼岸，也就是涅槃境界。

大乘与小乘的区别主要在四个方面：首先，小乘把释迦牟尼看成人，小乘之“佛”专指释迦牟尼；而大乘则把他绝对神化，认为佛是全智全能、先知先觉、大慈大悲、法力无边的最高人格神，有许多化身，如二身、三身以至十身。其所言的“佛”泛指能“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者，不仅指释迦牟尼，而且还包括了三世十方的无数佛，如过去七佛、燃灯佛、未来的弥勒佛等。

其次，小乘主张“我空法有”，否认实有的我体，承认客观物质世界的存在；而大乘主张“我法两空”。

第三，小乘追求个人的自我解脱，主张修戒、定、慧三学（意即通过持守戒律、修习禅定而获得智慧）和八正道，以断除自己的一切烦恼、超脱生死，成就阿罗汉果位为最高目标；大乘则认为没有众生的解脱就没有个人的真正解脱，主张普渡众生。在修行上偏重于“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和“四摄”（布施、爱语——对众生以慈爱的语言和态度加以劝慰，利行——做利于众生的事，同事——与众生同处，随机教化）的菩萨行。

最后，小乘认为要实现修行的理想就必须出家；大乘则认为出家、居家均可。

佛教发展到 7 世纪后，大乘佛教的一些派别同婆罗门教混合，形成了一个新的教派——密教，从此佛教便渐渐在印度衰落了。到 13 世纪，伊斯兰教从中东地区传入印度，大量的佛教僧侣被杀，众多的佛寺及佛教文物遭到毁灭，使本来已经衰落的佛教又遭到了致命的打击，更加一蹶不振。此后，经过漫长的时期，佛教才从斯里兰卡返回印度，重新得到复兴。

2. 古老的佛寺雏形——精舍与支提

佛寺是佛教僧侣进行宗教修习、举行宗教仪式以及生活居住的场所。在梵文中称为“僧伽蓝”或“僧伽罗摩”，意思是“众园”即僧众共同居住的园林。“寺”在中国最早并不为佛教所专有。先秦时代是对宦者居所的一种称呼。到了汉代，它的意义完全改变了，一般的官署、官舍建筑全部被称为“寺”，如政府机构中，负责掌管各国使节往来的外交事务部门被称为鸿胪寺等。以“寺”来特指佛教寺院则是在东汉明帝时期。早期的佛教史籍中，由于各译经者的不同，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名称，如：僧院、僧园、阿兰若、兰若、招提、精舍等。随着佛教的发展，渐渐又有了一些别称，“丛林”即为其一，大概是由于佛寺中众多的僧人聚集在一起念经修道，就好像树木丛集为林一样的缘故吧。由于女性出家者的出现，受中国男女有别思想的影响，本来是僧尼们修行所用的“庵”或“庵室”、“庵寺”，也渐渐成了尼姑们专用的修行场所了。更通俗的称呼大概应当算是“寺院”了。称佛寺为寺院的原因是因为中国的佛寺在建筑风格及特点上都是典型的中国院落式的，每一进佛寺都包括大大小小的几进院落，与中国的宫殿、官署、民宅并没有多大的区别。

佛教史上最早的佛寺建筑在古代印度的两个城邦国家中，被称为“竹林精舍”和“祇园精舍”。它们是佛教寺院的开端。

据佛经记载，佛陀在世时，摩揭陀国的首都王舍城有一座很大的竹园，为富豪迦兰陀所有。迦兰陀本已将竹园献给了“外道”（佛教以外的派别），但是在听了释迦牟尼佛的传道之后，便改信了佛教，转而将竹园献给了佛。摩揭陀的国王频婆沙罗又在竹园中建立房舍供佛陀及其弟子们居住，被称为“竹林精舍”或称为“迦兰陀竹园”。是印度僧园之始。

后来，在舍卫国（在今印度西北部拉普地河南岸）另有一位叫须达多的长者，因乐善好施，常以财物周济孤独贫困者，故而得名“给（jì）孤独”。他本事外道，并不事佛，一次因偶尔听了释迦牟尼佛的讲道，顿觉心开意解，善根发现，证得初果，遂诚请佛光顾舍卫国讲道。佛接受了给孤独长者的邀请，前往舍卫国说法。长者为了迎接佛的到来，以重金议购王子祇陀在舍卫城南的花园，想造一座精舍供佛说法时使用。王子开玩笑要求他以金砖铺地为代价，长者果然按王子的要求办了。王子非常感动，也想作一功德，遂将园中地面出售给了长者，而将园中树木奉献给了释迦牟尼佛。因此，精舍修成后，便以长者和王子的名字来共同命名，称为“祇树给孤独园”。他二人以后在佛教中还与波斯匿王一起被作为守护寺庙的伽蓝神，加以崇奉。释迦牟尼佛在祇树给孤独园中说法并居住了 25 年。唐代玄奘法师去印度时，精舍已毁。

精舍的形制一般都是以佛塔和佛殿为中心，僧房环绕在其四周，为四方式的宫塔建筑。这种形制对中国早期佛寺中出现的廊院式建筑形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汉地第一座寺院白马寺“为四方式，凡宫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宫塔制度”包括“宫”和“塔”两部分，宫是中国式

的宫殿，塔是印度的窣(sū)堵波。意思是墓葬，是埋葬佛的遗骨或遗物的地方。塔传入中国后，成为供奉佛像的地方，故又称为佛塔。中国西陲 3-4 世纪的伊循米兰古寺遗址、龟兹雀离大寺、阿奢理贰大寺遗址、晋高昌西克普古寺遗址、唐于阗丹丹乌里克小寺遗址等，主体也都是四方宫塔式。北魏杨衒之所著《洛阳伽蓝记》对永宁寺的记述更将这一形制作了详细描述，说永宁寺是熙平元年(516)灵太后胡氏命令修建的，寺中有一座九层的塔，塔的北面有一座佛殿，形状就象皇宫中的太极殿。全寺有僧房楼观一千多间，寺的四周有廊房围墙环绕，四面还各开有一门。虽然这种廊院式形制的寺院建筑由于受到中国传统建筑格局的影响，在中国佛寺发展史上仅仅存在了很短的时间，而且至今已经荡然无存了，但它毕竟代表了中国佛寺发展的一个原始阶段，并且还传入了日本，日本的飞鸟寺和天王寺就是仿造这一形制而建造的，建造年代相当于我国的南北朝时期。汉唐时代，葱岭以东至敦煌以西地区，宫塔式始终是佛寺形制的主流，天竺佛寺的这种形制对中国西陲的影响较中原地区为甚。

另一种在古印度与佛寺建筑相关的建筑是“支提”，或译为“制底”，它本是最早的佛塔形式，但与埋藏佛舍利、佛骨等的塔所不同的是，它的内部并无舍利，常常凿窟而建，塔在窟的后部，塔前有一个较大的集会礼佛的场地，被称作庙，即所谓的塔庙。传入中国后，发展成为中国的石窟寺。但是中国的石窟很小，没有了集会的地方，而是在洞窟的前面或旁边另建寺院，作为僧尼居住和集会之所，原来窟内后部的塔发展成为了塔柱或中心柱，无论形式或用途都与印度的“支提”不同了。

3. 中国佛寺的早期记录

佛教传入中国的大概时间是公元 1 世纪，中国佛教史上有所谓“明帝感梦求法”的说法，不论其说法是否精确，但它却促成了佛寺在中国的传入。史载，东汉明帝有一天小睡，梦见一神人，身穿金甲，头顶射出白色霞光，面带微笑，频频颌首，飞在殿前。梦醒后明帝请群臣解梦，众臣都回答不出，只有太史傅毅禀告说：天竺国有一位得道高人，号称为“佛”，能在空中飞行，而且身上还能发光。这一定是佛显圣托梦于君，预示着王国一定会更加昌盛。明帝恍然大悟，高兴万分，遂决定派羽林郎中蔡愔(yīn)、秦景、博士王遵等 18 人，前往天竺求取佛经。永平十年（67），他们从大月支请到天竺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抄写回佛经《四十二章经》，并带回了佛像，存放在皇帝图书馆兰台石室中。佛教从此传入了中原。明帝以贵宾之礼将迦叶摩腾与竺法兰安置于鸿胪寺。次年，在洛阳雍门外，一座新的僧院建成，名为“白马寺”。这时的人们并不知道他们建造的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马，是为纪念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以白马为中国驮来了佛经、佛像；“寺”则完全是借用了“鸿胪寺”的称呼。从一开始人们就将佛寺与官署建筑完全等同起来了。

尽管白马寺的出现已经标志着佛寺在中国的正式出现，但由于这时佛教教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发展尚不完备，中国人的佛教观念还没有形成，人们只是将佛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神仙方术和黄老道术等同看待，佛只是自然界中的一个神灵

而已。所以，官府只允许为西域僧人立寺，汉人不得出家，更不用说建寺了。严格意义上说，这时的寺院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祠堂很相像。《后汉书·襄楷传》引襄楷延熹九年(166)奏议，批评汉桓帝在宫中立“浮屠之祠”，这是我国宫廷设置佛寺的最早记录。东汉时丹阳郡笮融“大起浮屠，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许人，作黄金涂像，衣以锦彩”，这是中国历史上有关佛寺具体描述的最早文献记录。

太康元年(280)，晋武帝司马炎改变汉魏只有西域僧可立寺的政策，大力弘扬佛教，广建佛寺。据《魏书·释老志》载：“西晋二京合寺一百八十所。”大规模的佛寺建造从此开始。

4. 中国佛寺的基本布局

在寺院建筑中，我们首先要明确的一个概念是“殿堂”，事实上，这里包含有两个不同的意思，殿是指供奉佛像的地方，是专供僧侣和信徒礼拜的场所；堂是供僧人日常起居、讲经布道的场所。中国最早出现的佛寺布局形式是廊院式，这是仿效印度寺院的形式而来的，即每一个佛殿四周被廊院所围绕，一个寺院可以由许多廊院组成，每个院落可以独立存在，并有各自独立的名称，如观音院、塔院、翻经院等。唐代长安的大慈恩寺在其盛时就有十几个院落。廊院式布局的特色集中反映在院内建筑的布置上，有的院内以塔为主体，有的以讲堂为主体，也有的堂塔并置。从建筑艺术的角度看，这种廊院式的寺院主题较为分散，而且不易建在

地形复杂的地区，所以渐被纵轴式的布局所代替。至今，这种廊院式布局形式的寺院在中国已无存，仅在个别寺院布局上尚存有这种形式的某些痕迹，但日本奈良的法隆寺布局仍是典型的廊院式。

中国寺院应用最普遍的布局形式是纵轴式，佛寺的建造一般是坐北朝南，即是将各主要殿堂按照从南向北的顺序，依次排列在南北中轴线上，每个殿堂前左右各置一座配殿，形成三合或四合院落。整座寺院由两大区域组成，一是供佛区域，这里是僧侣及信徒们进行各种法事活动的地方；二是僧侣们的生活区。保存至今的一些早期著名的佛寺，如河北正定的隆兴寺，天津蓟县的独乐寺，浙江宁波的保国寺、天童寺都是这样的布局。

供佛区域是寺院的主体建筑，各大佛殿分别为：山门殿—钟、鼓楼—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藏经阁。

僧侣的生活区一般集中在寺院的东侧，设有僧房、香积厨（厨房）、斋堂（食堂）、茶堂（接待室）、职事堂（库房）以及厕所。

在寺院的西侧则设置接待云游僧人的云会堂。

中轴线上各进院落可以借助立体建筑不同的造型、院落空间的狭广以及附属建筑的不同，展现自身的变化及特色。一些较大的寺院还可以同时拥有两条或三条纵轴，将塔院、禅房或花园等都建在侧轴上。这种佛寺布局形式在中国应用的时间最长，地域最广，是汉化佛寺的典型形式（图 1）。

无论您到哪座寺院，首先必须进门，佛寺的这道门就叫山门，青砖绿瓦垒砌出三个拱型门洞，最大的居中，两旁是两个较小的。按照佛教的说法，最初称为“三门”，意即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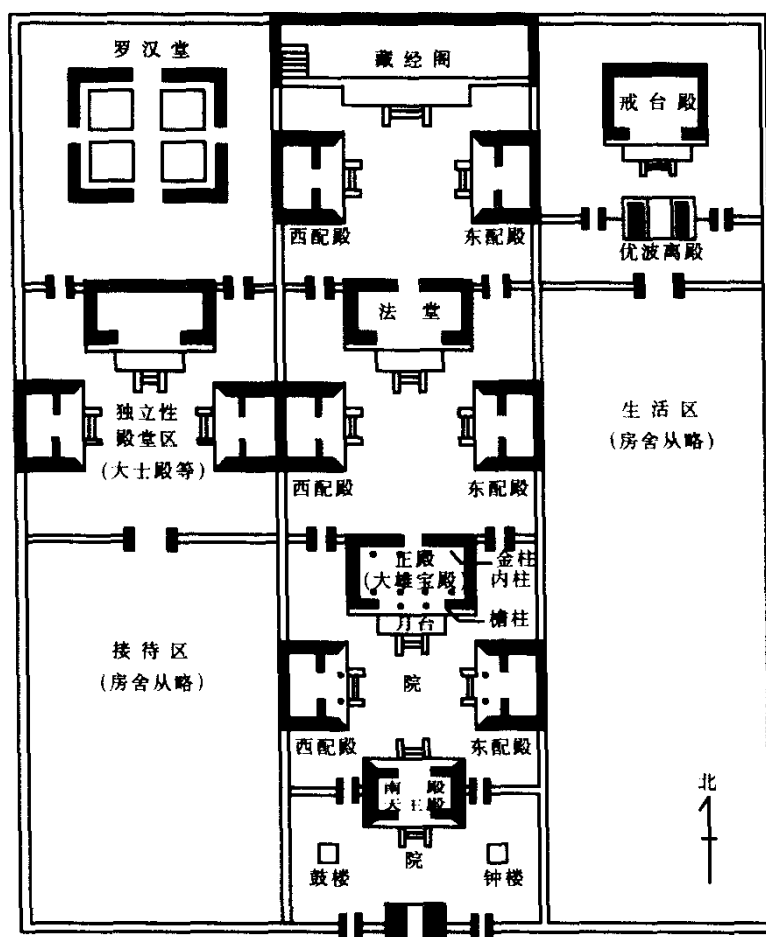


图 1 近现代汉化佛寺典型配置平面示意图
(引自李鼎霞、白化文《佛教造像手印》一书)

解脱之门，象征着空门（观人法两空）、无相门（观诸法无相，本无差别）和无作门（观生死可厌、不可愿求）。也被称为涅槃之门。我们常说的“遁入空门”就是由此而来。后来由于中国佛教的大多数寺院都建在山林之中，“三门”便逐渐演变成了“山门”。虽然对于平原地带的佛寺未作考虑，但是还是顺其自然地沿袭了这一称呼。惟一不同的地方是，

隐藏在高山密林中的寺院可能不止一道山门，有的有两道，甚至三道，而平原地带的寺院却仅有一道。山门是将世俗世界与宗教世界隔离开来的一个象征性建筑。

进入山门之后，便是第一层院落，院中正面是金刚殿。有的寺院常常将金刚殿与山门合二为一来建造，保留中间一门，将两旁的二门变成了不能开启的假窗，成为一座面阔三间的殿堂，这个殿堂既是山门，又是金刚殿，遂被称做山门殿。更有甚者，还将金刚殿后面的天王殿也并入了山门殿中，山门殿遂又成了天王殿。

穿过山门殿，便可以看见东西相对的两座钟鼓楼，居东的为钟楼，居西的为鼓楼。早晨先敲钟，后击鼓；傍晚先击鼓，后敲钟，晨钟暮鼓的美景便是由此而生发出来。敲钟击鼓的作用不仅是为了报时，而且为了作法事的时候召集僧侣。

钟鼓楼之后的第一座大殿便是天王殿，殿正中常常供奉着雍容大肚、笑口常开的弥勒佛。在弥勒佛左右两边的山墙前，各供奉着两尊天王，称为四大天王，天王殿的名称即由此而来。在弥勒佛像的背后，还供奉着身着铠甲、手持宝杵、气宇轩昂的韦驮天。他与弥勒佛呈背靠背站立，遥望着前方的大雄宝殿。

大雄宝殿是佛寺中最主要的大殿，是佛寺的中心，其中供奉着佛教信仰的最高神释迦牟尼，因佛教徒尊称释迦牟尼为“大雄”，固而得名。僧侣及信徒们礼拜、瞻仰佛、举行重大佛事活动时也是在此。这里的建筑雕梁画栋、恢宏亮丽，庄严而神圣。

大雄宝殿的背后便是法堂，这一称呼是从禅宗来的，意思是“演说佛教大法之堂”。佛教的其它宗派则称之为“讲

堂”。但在陕西目前尚存的寺院中，非禅宗的寺院也有许多称为法堂的，如陕西的大慈恩寺、大兴善寺和兴教寺等。寺院中讲经说法、宣誓皈依或有关的集会等活动都在此举行，其地位仅次于大雄宝殿。

法堂之后便是藏经阁，佛教的经书多被保存在此。

以上这些建在寺院中轴线上的建筑是每座寺院都应有的，在有的寺院中，藏经阁也可能被建在中轴线以外，其中轴线上还建有卧佛殿，如陕西的兴教寺，殿内供奉的是释迦牟尼佛涅槃时的形象：侧身而卧，一臂直伸，一臂曲撑在头部，神态泰然而安详。除了中轴线上的大殿外，与它们相配而组成三合院或四合院的配殿，在一些较大的寺院中都有建造，如地藏殿、伽蓝殿、祖师殿、药师殿等，另外，在某些较大的寺院中还建有罗汉堂。

5. 中国佛寺中供奉的造像

实际上，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由于他反对偶像崇拜，因而其弟子及信徒们从未为他建造过任何塑像。在他去世之后的大约 500 多年的时间内，信徒们仍然坚守着这一规定，不以人的形象来表现佛的形象。

根据佛经的记载，释迦牟尼佛曾经应帝释天王之请，上忉利天宫为自己的母亲摩耶夫人演说佛法。这时，憍赏弥国（古代印度的一个城邦国家）的优填王十分想念释迦牟尼佛，于是便命人用一种带有芳香味的旃檀木雕刻了一尊五尺高的释迦牟尼佛像。而与此同时，在另一个城邦国家舍卫国中的波斯匿王也因思念释迦牟尼佛而命人以磨金（一种带紫色的